

袁宏道著作的印行及其文坛影响

李 瑄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成都 610064)

摘 要: 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作家文坛地位的外缘因素大致可分为权威性与非权威性两类。为成就文坛事业,袁宏道曾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发声,其中之一是利用晚明迅速发展的印书业。万历二十五年到万历三十七年,其诗文著作至少刻印过十五次,可称为“密集滚动式”印行。其读者除了士大夫阶层,还经由商业出版扩散至下层文人。传媒效应扩张了袁宏道的文化影响力,带动不少文人改变欣赏趣味和写作方式,冲击了当时的文学主潮;袁氏也因此成为时代文坛不可忽视的突起异军。袁宏道的成功,切实体现了来自士大夫以外文化圈的非权威性因素影响晚明文坛格局能力的上升。

关键词: 袁宏道;明代出版业;晚明文坛;书种堂

中图分类号: I 21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6)02-0109-09

一、成就作家文坛地位诸因素与 袁宏道的不朽之志

袁宏道是晚明文学史上的风云人物。他激烈抨击流行的复古文学思潮,又尝试突破诗文写作的旧有规范,引起了当时文坛的广泛关注,最终带动了时代文学风气的转变。今天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已为世所公认,但对于研究者来说,尚需进一步追问其地位形成的过程。这其实是对文学史生成过程的考察。文学史的面貌反映了史家对某一时代文坛基本格局、某些作家文学地位的认识。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受两个基本因素的影响:一是历史评价的积累,主要包括该作家在世时的文坛评价与历代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的评价;二

是文学史写作者的观点,除了其个人的理论思考与趣味偏好,也间接反映了其所处时代的文学思潮。

袁宏道在晚明文学史上的地位经历了一个从逐渐受关注到基本被认定、再不断强化的过程。在文学史书写层面,有两次关键性认定:第一次是明清之际钱谦益编选《列朝诗集》,认为:“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①此后朱彝尊的《明诗综》^②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③皆沿袭其说,其扭转晚明文学风气的关键地位遂得确立。第二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健将周作人、林语堂等将其作为近现代文学的先声,鼓吹其作品对自然人性的书写;袁宏道从此成为“性灵”文学的代表,被赋予了晚明个性解放思潮中文学典型的意义。^④追

收稿日期: 2015-09-09

作者简介: 李瑄,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1YJCZH089)及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项目批准号:skqx201506)。

① 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第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317页。

②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8页)云:“隆、万间,王、李之遗派充塞,公安昆弟起而非之。……一时闻者涣然神悟,如良药之解散,而沉疴之去体也。”

③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卷一七九《袁中郎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18页)言其排抵前后七子,“致天下耳目于一新,又复靡然而从之”。

④ 五四时期袁宏道及公安派的评价,参见吴承学、李光摩:《20世纪晚明文学思潮研究概述》,《晚明文学思潮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究起来,最初使袁宏道在文学史上获得一席之地的权威认定是钱谦益《列朝诗集》的评价。再回溯至晚明,《列朝诗集》对袁宏道的重视又来自其本人生前已经取得的文坛影响力。

袁宏道本来不过是一个湖北公安偏僻小城的普通士子,居然一跃而为时代骄子;他扫荡绵延明代诗坛百年的复古风习,被文学史家认可为晚明文坛不可或缺的重量级人物,可以说成就惊人。令人感兴趣的是,其成就从何得来?除了幸运之神的光临,还有哪些原因造就了他?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在某一作家生前影响其文坛地位的因素一般有以下几点:就作家本人而言,首先是作品要满足时代审美需求。或者投合既已形成的审美趣味;或者突破已有的审美习惯,通过带着新鲜特征的作品挽救世人对旧风气的审美疲劳。其次是作家的家世与文化背景。在讲究门第的先唐时代,这个因素尤为重要。还有作家的政治地位。在政教合一的中国古代社会,士大夫是文坛的主体成员,官方认定的文化权威机构有强大的话语权。虽然作家的政治地位不能代替文坛地位,但如果执掌文职并加意文苑事业,则官员身份多能放大其文化影响。在台阁文风盛行的时代尤其如此。此外还有一些因素可以成为助力,如文坛前辈大佬的奖掖与提携往往是文人崭露头角的桥梁;一些文人通过共同活动借助群体之力为人所知;同时代理论家或诗文选家的关注不仅能反映该作家的认可度,帮助其提高声誉的作用亦不可忽视。总的来说,既有来自文学史发展理路的内在因素,也有外缘因素。外缘因素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作家家世、职位、前辈提携等权威性因素,另一类是文化活动圈、评论家意见、选家重视度等非权威性因素。在政治对文化的掌控力较强,或中央文化圈向心力较强、人们倾向认同权威的时代,前一类因素占主导地位;而在价值多元化、人们自我意识较强的时代,后一类因素常常比较活跃。当然,这两类因素并不都能截然分开,它们有时是互相混杂的。

再回到袁宏道,他成名的主要原因是顺应了文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即其排击复古风气的主张切中了时代文坛的需求。然而在他之前已有徐渭、归有光、汤显祖等人反对过复古派,却均未形成声势。可见尚有其他因素合力放大了他的文坛影响。从外部来看,若论权威性因素,其劣势十分明显。平民出身,祖上从无仕宦经历,也无骄人的文化背景;兄长袁宗道虽然仕途顺利且职任翰林,但并不先以文学名世;在他的文艺之路上,没有出现过为其提携鼓吹的文坛大佬。那么,他究竟利用哪些因素获得了成功?

袁宏道很早就表现出文坛上的志向,袁中道记其少年时:“每至月明之夜,相对清言,间及生死,泫然欲涕,慷慨歔歔,坐而达旦。终不欲无所就,乃刻意艺文,计如俗所云不朽者。”^①可是,不朽的实现谈何容易,再好的作品也可能淹没于历史的尘埃。袁宏道对此有深刻的体会:他曾偶然发现“今之李杜”^②“我朝第一诗人”^③徐渭,可是当时徐渭黯然无名,若非袁宏道后来的极力推广,恐怕这个名字将不为后世所知。因此,他应该非常明白,除了文字上的修炼,还必须跻身文坛发出声音,引起世人的关注和反响。这并非易事。他尝试过各种途径努力发声,其中有些手段是前代作家较少使用的:例如通过作品的密集印行播散影响的种子。

二、袁宏道著作在其生前的刊刻与流传

对出版业的高效利用,是袁宏道获得文坛成功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他极为留意个人作品的刻印和传布,几乎每有著述立即梓行。但除了钱伯城在《袁宏道集笺校凡例》中简略的说明,尚未见学者对袁宏道著作出版情况作专门研究。清理其历年来作品的印行过程,有助于明晰掌握其文坛影响力逐渐放大的过程。据各种别集、序跋、书目的记录及笔者多年访书了解的情况,从万历二十五年到万历三十七年这十三年之间,其诗文著作

① 《解脱集序》,袁中道著,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51页。

② 《孙司李》,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二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46页。

③ 《吴敦之》,《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第506页。

至少刻印过十五次,具体如下:

万历二十五年刻《敝篋》《锦帆》二集(已佚)

袁宏道文字的首次刊刻,可以确知是在万历二十五年年初他离任吴县县令前后。共刻印了两种小集,出仕前诗汇辑为《敝篋集》二卷,令吴两年来所作诗文汇辑为《锦帆集》四卷。江盈科把成书过程交代得比较清楚。《敝篋集引》曰:“及其令吴二年,移病乞归。友人方子公为检其图书付行李,从敝篋中得君诗一编,读而旨于味,曰:‘异哉,有物若是而以供蠹鱼,其不尽充蠹鱼腹也,其犹有物护之欤?’于是稍稍哀次,付诸梓,题曰《敝篋集》。”^①

《锦帆集序》云:“其行也,友人方子公稍稍哀次付诸梓,问题于君,君自标曰《锦帆集》。”^②

则此二集由袁宏道门客方文僊(字子公)整理,袁宏道定名。由于方文僊长期依附于袁宏道,编辑整理必尊其意,故可视为袁宏道自定。主持刊刻事宜的是江盈科。钱希言曰:“于是江侯眷焉。使君之别也,悉哀其署中所藏遗帙,序而刻之,曰:‘不谷他日请以《百花洲》自署,夸袁郎之《锦帆》,可乎?’趣召嗣氏受役县斋庑后。”^③由江盈科出资并召集刻工,这次刻书当属文人小规模私刻文集性质。刊刻之始在袁宏道病休吴县时,《敝篋集》先成;等全部刻完,他已离开吴县放舟五湖去了。^④其流通的主要方式是作者赠送亲友。在二集陆续刊出的过程中,袁宏道已经迫不及待以之广赠友朋。^⑤也许因为印数较少,此二集今未见,或已不存。

万历二十五年刻《解脱集》(已佚)

袁宏道离开吴县以后漫游东南,短短数月之内所作诗文各成二卷,刊刻事宜仍然托付于江盈科。漫游途中他寄诗给江,说:“奚囊虽小狭,所贮尽奇珠。世无售珠人,欲开复踟蹰。……具眼非无人,要与慧眼殊。持此试江郎,江郎售也无?”^⑥属望江盈科为其经营刊发的意思很殷切。江《解脱集引》云:“中郎以病解官……还过姑苏。余晤君江上,奚囊所贮诗凡若干首,自题曰《解脱集》。”^⑦杭州名士虞淳熙为此集题词,记时“万历丁酉夏五月”^⑧,即万历二十五年五月,应该就是《解脱集》诗二卷刊刻的最早时间。不久袁宏道整理游记、书信二卷,也寄给江盈科,仍旧请他刊行。江盈科《解脱集二序》云:“中郎还自武林,示余《解脱集》凡二卷,皆诸体诗也。余为序而传之。无何,君渡江侨寓真州,邮致后二卷示余,则其浪游时所撰山水记,与夫朋侪往复诸尺牍云。”^⑨是时袁中道依傍宏道左右,序该集曰“中郎力矫敝习,大格颓风”,又用“昔昌黎文起八代之衰”^⑩相比附,以力挽一代文坛风气相推许。耸动文坛、扭转时风,应该就是袁宏道《解脱集》写作暗怀的野心,也是他急于让此集面世的动机。

万历二十六年刻《广陵集》(已佚)

《广陵集》的名字不见于袁宏道现存文字,后来袁叔度汇刻的袁宏道诸小集也无此集。然而袁中道在《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言之凿凿地说:“有《广陵集》,弃吴令就教,暂携妻子寓

① 江盈科著,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399页。

② 《江盈科集》,第400页。

③ 《重刻袁使君锦帆诸集序》,《锦帆集》卷首,万历三十一年刻本,日本内阁文库藏。

④ 《锦帆集》中尺牍《倪崧山》云:“一病五月,遂尔投冠。今已放舟五湖,作物外人。”(《袁宏道集笺校》卷六,第307页)

⑤ 《锦帆集》最后一卷末尾数篇,多见以“小刻”“小刻二种”“小刻二册”赠人。尺牍《范长白》云:“小刻二种呈上,诗皆少时之作,无可观者,聊资捧腹。吏吴有《锦帆集》,刻成当专致请教。”(《袁宏道集笺校》卷六,第305页)此“二种”“少时之作”,应指《敝篋集》二卷。前所谓“小刻”者,或亦如之。尺牍《王百谷》中又有“小集四册致上”(《袁宏道集笺校》卷六,第302页)的说法,可能是将《敝篋集》二卷与《锦帆集》先成的前二卷赠与王稚登。

⑥ 《舟中寄江进之得珠帘字》,《袁宏道集笺校》卷九,第413页。

⑦ 《江盈科集》,第402页。

⑧ 虞淳熙:《解脱集题词》,《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5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80页。

⑨ 《江盈科集》,第404页。

⑩ 《解脱集序》,《珂雪斋集》卷九,第452页。

仪真作也。”①《中郎先生全集序》又说:“《广陵集》,去吴客真州时作也。”②《广陵集》现存最早的是《袁中郎十集》本。《十集》由与袁氏毫无联系的书商汇刻,书商无从获得袁宏道手稿,当以流通的刻本为底本。③故《广陵集》应该曾有单行本。其刊刻时间应在万历二十六年。袁宏道在《答张东阿》一信中说:“拙稿存笥者,今已付木,尚未卒业。一穷广文,骑款段长安道上,虽极落寞,差不废吟咏耳。”④他作“穷广文”京兆校官期间,《敝篋》《锦帆》《解脱》诸集皆已刻成,“存笥”之稿唯有《广陵》篇什。在稍后的《答谢在杭司理》中,袁宏道说:“小刻较前稍有增定,寄上请教。”⑤或即刻完以之赠人。⑥

万历二十七年刻《广庄》《瓶史》(已佚)

万历二十六年冬,袁宏道著《广庄》,次年春著《瓶史》,随即以此二书赠人。《答陶石簪》云:“《广庄》是弟去冬所作,《瓶史》乃今春著得者,俱附上请教。”⑦梅国桢、沈朝焕、焦竑、冯琦、刘一煜等人前后获赠,则万历二十七年二书当已刻成。

万历二十八年刻《西方合论》(已佚)

万历二十七年,袁宏道著《西方合论》十卷,有引文,称“始于己亥十月二十三日,成于十二月二十二日”⑧;次年“仲春之廿有三日”⑨袁宗道作序文,该年夏袁宏道即以之寄赠陶望龄。⑩袁中道谓此书在袁宏道生前已行世,⑪则万历二十八

年春夏之际或已刻成。

万历三十一年刻《西方合论》⑫

万历三十一年,黄应泰等人刻《西方合论》十卷。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有存。书前有袁宗道序,序末题:“癸卯秋月文昌里发僧程衷素为刘圣邻书以登梓”。癸卯即万历三十一年,程衷素是晚明著名书家。⑬全书字体统一,应该是由程衷素执笔的写刻本。序及卷一书脊有“黄应瑞刻”、“黄应泰刻”“黄应台刻”,主持刻印者可能是黄氏兄弟;然其身份实难考证。卷一列“北京慈慧寺沙门真贵、冷云居士袁宗道、上生居士袁中道、皖浮渡山始光居士吴用先、石洋居士王祚、无净居士黄辉共校”。实际上万历三十一年袁宗道已经离世,“共校”不过是伪托之言。袁宏道及中道等人的现存文字中均未提及过此一刻本。刘圣邻见于潘之恒《建慈光寺记》,是黄山地方的居士⑭;程衷素也是安徽人:此刻或为安徽好佛文人的私刻。如果确实如此,则可见出袁宏道著作在当时已迅速流行。

万历三十一年袁叔度刻《锦帆》《解脱》二集(清荫堂本)

万历三十一年,吴县书商袁叔度刻袁宏道《锦帆》《解脱》二集。袁叔度,字无涯,在袁宏道作吴县县令时曾受知门下。此次刻书始末,钱希言《重刻袁使君锦帆诸集序》交代得很清楚:“余

① 《珂雪斋集》卷十八,第763页。

② 《珂雪斋集》卷十一,第521页。

③ 袁中道屡有辨斥《十集》中《狂言》《狂言别集》二种是书商为牟利掺入的赝著,但从未质疑过《广陵集》的真实性。

④ 《袁宏道集笺校》卷二十一,第754页。

⑤ 《袁宏道集笺校》卷二十一,第761页。

⑥ 《答张东阿》与《答谢在杭司理》,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系于万历二十七年,何宗美《袁宏道诗文系年考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据谢肇淛行踪,辨《答谢在杭司理》作于万历二十六年,可从。

⑦ 《袁宏道集笺校》卷二十二,第779页。

⑧ 《西方合论引》,《大正藏》第47册,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2008年印行,第388页。

⑨ 《西方合论序》,袁宗道著,钱伯城标点:《白苏斋类集》卷二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20页。

⑩ 《答陶石簪》曰:“《西方合论》是弟残冬所著,恐尚有不亲切处,幸详悉正之。”(《袁宏道集笺校》卷二十二,第791页。)

⑪ 见《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

⑫ 承台湾清华大学简凯廷博士提示该书信息,特此致谢。

⑬ 见何绍基:《重修安徽通志》卷262,清光绪四年刻本。

⑭ 见闵麟嗣:《黄山志》卷三,清康熙自刻本。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中国基本古籍库》影像。

友袁无涯者,读先民书,修居士行,里中佳公子也。昔稍受知使君门下。使君去,手其遗文不忍释,既乃慨流传之弗广,一旦投觚而起曰:‘吾人研精载籍,往往见圣贤毛发于千百世之下。生幸与袁公同时,又辱品藻,岂可当吾世而失公哉!’乃益鸠其所镌诸编,一一校而新之。……《锦帆》四卷……《解脱》四卷……。”^①重刻的原因是原刻不易见,欲广其流传。所刻二种是《锦帆》、《解脱》。重刻时间,钱希言说是“万历癸卯春日”,即万历三十一年春。

袁宏道此时乡居柳浪,给袁叔度的书信显示,他在事前曾得到知会。虽然其有“幸谨藏之奥,为不肖护丑,勿广示人也”等谦饰之辞,随即却说“戊戌以后,稍有著述,去僧忙不及录寄,附去《广庄》及《瓶花集》诗各一册,余俟怡山还致之”^②,态度显然是积极配合的。

此刻既以扩大流通为目的,印数较江盈科原刻可能大增。《锦帆集》今可见于日本内阁文库、台湾国家图书馆二处。内阁文库本保存完整,卷首录江盈科原序和钱希言《重刻序》。卷二终落款“勾吴袁叔度无涯甫重校于法水院之清荫堂”。《解脱集》未见,唯潘之恒《鸾啸小品》收录题词一篇。

万历三十二年刻《德山麈谈》(已佚)

万历三十二年,袁宏道与楚僧寒灰、雪照、冷云,诸生张明教入德山消夏;谈玄之言,由张明教记录编次。是年冬,袁宏道“拣其近醇者一卷,付之梓”^③,是为《德山麈谈》。或又名《德山暑谈》,见于陈继儒《珊瑚林序》和冯贲《珊瑚林跋》。^④

万历三十三年刻《桃源咏》(已佚)

万历三十二、三十三年,袁宏道与中道及数友人游览桃源,归而刻诗一卷,即《桃源咏》。现存沈淮引文、曹蕃跋文,皆作于万历三十三年^⑤,该集当首刻于是年。刻成后,袁宏道即以之寄赠李腾芳、顾天竣。^⑥此刻今未见,《桃源咏》常见者为《袁中郎十集》本。

万历三十四年绣水沈氏刻《广庄》《瓶史》(尚白斋本)

万历三十四年,浙江绣水沈德先、沈孚先兄弟刻《宝颜堂秘笈》,有《新刻陈眉公重订广庄》一卷、《新刻陈眉公重订瓶史》一卷。该书虽题为“陈眉公重订”“陈眉公家藏秘笈”,但实乃沈氏兄弟借重陈继儒之名为推销手段,校刻之事皆沈氏经营,故又以沈氏“尚白斋”题刻。^⑦此刻今较常见,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台湾国家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多地均有藏本,可能当时印数非常可观。沈氏兄弟虽然有官员身份而非纯粹书商,但《宝颜堂秘笈》从选材、题名、推销等环节来看实有商业运作的性质。考察该丛书的营销策略,沈氏是有意做成一套畅销书。袁宏道有两种书入选,足见此时他已经受到出版业的青睐,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万历三十四年刻《觴政》(已佚)

袁宏道乡居柳浪期间,著《觴政》一卷。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谓其成书在万历三十四年^⑧,该书的首刻也应在万历三十四年秋袁宏道三度出仕之前。有二证:其一,袁宏道《与潘景升》一信中言:“《觴政》一册寄览。”^⑨观信中“客自吴中

① 《锦帆集》卷首,万历三十一年刻本。

② 《袁无涯》,《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二,第1251页。(据何宗美《袁宏道诗文系年考订》第308页,此文作于万历三十年)

③ 《德山麈谈》小引,《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四,第1283页。

④ 《珊瑚林》卷首、卷末附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311册,第1、54页。

⑤ 沈文曰:“近得绿萝主人恶耗。”绿萝即江进之,卒于万历三十三年。曹文落款曰:“万历乙巳九月下浣。”二文俱见《袁中郎十集》本《桃源咏》(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卷首。

⑥ 见《李湘洲司业》,《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三,第1264页。

⑦ 见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丛书类《宝颜堂秘籍》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21页)。汪世清对沈氏托名说有确考,见《“画说”究为谁著》,《汪世清艺苑查疑证散考(上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5页)。

⑧ 《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八,第1422页。

⑨ 《与潘景升》,《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十五,第1598页。

来,道……”,“闻长孺近在燕……”云云,可知作此信时袁宏道尚未到北京,则此信当发于公安。其二,袁宏道《与黄平倩》一信中亦曰:“《觴政》一册附上,大可为酒场欢具也。”^①此信何宗美《袁宏道诗文系年考订》系于万历三十四年,可从。^②据此,万历三十四年秋袁宏道离乡入京之前,《觴政》已刻成送人。万历三十六年李祝说“《觴政》旧已剞劂”^③,指的应该就是此刻。

万历三十四年刻《瓶花》《潇碧》二集

《瓶花斋集》十卷、《潇碧堂集》二十卷,编录袁宏道再官北京及由礼部主事退居公安时所作诗文。因卷帙庞大,刻印可能陆续进行。万历三十一年袁宏道给袁叔度寄去“《瓶花》集诗”^④一册,应该就是先刻成的部分。到万历三十四年他入京之前,说“计月内可成帙”^⑤,则刻成应在离乡之际。此二集为袁宏道自筹资金刻行,故有“近日刻《瓶花》《潇碧》二集,几卖却柳湖庄”之叹。他应该得到过一些资助,如公安知县钱胤选就曾“分俸以助其成”^⑥。《瓶花斋集》有曾可前序,《潇碧堂集》有雷思霈序,或系曾、雷二人万历三十四年过公安^⑦时约作。此二集刻成后,袁宏道曾以之赠汪可受、黄辉、袁叔度、郭子章等人。今上海图书馆藏《潇碧堂集》二十卷、《瓶花斋集》十卷,与常见的书种堂本版式不同,或即此次所刻。

万历三十六年方文僊重刻《觴政》

《觴政》问世后,在文人圈中颇受青睐,万历三十六年,方文僊为之“重梓广传”^⑧。该编今存于浙江省图书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收录,前有李祝题词,后有方文僊跋。^⑨

万历三十六年至三十八年袁叔度刻《敝篋集》等六种(吴郡本)

万历三十六年开始,吴县书商袁叔度在书种堂重刻袁宏道诗文集。“重刻”行动说明了万历三十一年清荫堂本的出版成功,很可能是旧刻供不应求。这次袁叔度似乎有意策划一套袁宏道诗文全集,搜罗了《潇碧》《瓶花》《敝篋》《锦帆》《解脱》五种。因为刻印的规模很大,所以历时两年之久。也许由于清荫堂已经刻行过《锦帆》《解脱》二集,故万历三十六年先刻《潇碧》《瓶花》《敝篋》三种,万历三十七年刻《锦帆集》,《解脱集》至万历三十八年春才刻完。另外,袁叔度同期可能还在吴县的“禅悦山房”重刻了《广庄》,加上诗文集,共计六种。^⑩

此次刻印酝酿自万历三十四年。该年袁宏道寄书王稚登,曾云:“致声袁无涯,沟中之断,岂足复收而横被之绣也?”^⑪后又写信给袁叔度说:“至于诗文,乖谬尤多……而孰谓世有好之,如无涯其人者,无涯误矣。”^⑫可能袁叔度已经向他表

① 《与黄平倩》,《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十五,第1601页。

② 何宗美:《袁宏道诗文系年考订》,第345页。

③ 《觴政题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8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70页。

④ 《袁无涯》,《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二,第1251页。

⑤ 见《苏潜夫》(《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三,第1272页)。该文钱伯城系于万历三十四年,观文中“八月初间,弟当北发”,是。

⑥ 《答钱云门邑侯》,《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三,第1275页。

⑦ 见《曾退如、雷何思过柳浪湖。时退如初度,有诗见示,次韵答之》,《袁宏道集笺校》卷三十四,第1097页。

⑧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80册,第70页。

⑨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题为“万历三十八年刻”,误。有二证:一、李祝题词落款“万历戊申(三十六年)”;二、万历三十八年方文僊已去世(见袁中道《遊居柿录》)。

⑩ 钱伯城谓书种堂除诗文集五种外,尚刻《广庄》、《瓶史》二种(见《袁宏道集笺校》凡例),然今实未见。另有袁叔度所刻“禅悦山房”本《广庄》,板式与书种堂本略有小异,卷末题“勾吴赵一鹤治心、陈酬稷诚将同阅,张士驥坦之笔受,袁叔度无涯校梓”,或亦同期所刻;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书种堂本《瓶花斋集》后有附。《瓶史》则未见袁叔度刻本。陆之选《新刻钟伯敬增订袁中郎全集缘起》云:“吴郡六集、嘉禾十集,各为绣梓,不统一,构者憾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74册,第376页。)^⑪“吴郡六集”之说,合于今存世文献之数。

⑪ 《与王百谷》,《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三,第1271页。

⑫ 《袁无涯》,《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四,第1281页。

示了刻集之意,故有此谦辞。但他同时又寄给袁叔度新刻的《瓶花》《潇碧》《觞政》等,其真实态度是积极的。袁叔度终于搜全六集,应得力于袁宏道本人的配合。

这次除了所收作品数量齐全之外,印数应该也很大。存本散见于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等地。观其校勘精良、字形美观,实为精心经营之成果。虽然袁叔度以袁宏道门人自居,二人的关系在师友之间,但如此长时间、大规模的刊印,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他不可能没有回报预期。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内阁文库本《潇碧堂集》卷首特别有《书种堂禁翻豫约》。这一版权申禁,折射出此时袁宏道已是盗版者的目标,他成了可以给出版者带来利益回报的作家,其读者数量恐怕已非常可观。

万历三十七年曹征庸刻《破研斋集》(已佚)

万历三十七年,曹征庸刻《破研斋集》于秦中,朱一冯作序。^①朱一冯为袁宏道该年典试秦中的副考官,曹征庸亦袁宏道旧友同游华嵩者。因而这次刊刻很可能也有袁宏道本人的参与。

三、出版业的利用与文坛影响力的扩张

综合袁宏道在世时文集著作历次刊刻的主要信息,可以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文化动态。

(一)十五次刊刻中私刻共十二次。每种书的首次刻印都是私刻,主事者或为袁宏道本人,或为其至亲好友(虽然有五次主事者未能确知,但从相关记录来看,应该是其身边非常亲近的人)。每次袁宏道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可见他对于自己作品的印行非常经心,其出版意识在同代人中是超前的。即以其亲友至交而论,据袁中道记录,黄辉等人不注重著作的保存,故“十无五六存者”,惟有袁宏道“常加裒集,稿独全”^②。由于深刻意

识到出版的重要性,他还督促兄弟印行文集。袁宗道的诗文作被他“强以灾梨”^③,袁中道的诗也是他“惧其复逸也,故刻之”^④。今天袁宏道的诗文著作之所以能够有完整、多样的保存形态,首先得益于其自觉、主动的出版态度。

(二)这些刻印活动不仅有保存作品流传后世的功能,更着眼于当代文化影响的扩散。作为一个渴望成名的文人,袁宏道很可能把著作的刊行作为扩大影响、争取文坛话语权的重要手段。他非常重视刻书的时效,万历二十五年以后,几乎每有时地转移就整理诗文出版小集;每有著作问世也尽快谋求印发流传。其作品的刊刻频率很高,从万历二十五年开始,平均每年至少一种以上。这样迅速地将作品编辑刊发,恐怕是期望其尽快行世并引起关注;那么他应该非常重视出版活动对争取文坛发声权的作用。虽然晚明出版业的繁荣状态已经受到不少研究者的重视,但细加考察却可以发现文人对出版业作用的认识与利用程度仍有区别。据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万历时期的别集仍以总结性的全集为主,虽然有一些文人出版小集,如王士性、王世贞、屠隆等人,但总的来说数量不大,所占比例亦不足百分之十,没有形成风气。袁宏道身边的文人,包括其兄弟袁宗道、袁中道,关系最密切的江盈科、陶望龄、陶奭龄、黄辉等人,只有袁中道有一种小集《新安集》存世。^⑤可见袁宏道的出版活跃度处在时代前沿。这样频繁的出版当有积极参与当代文坛的意图,显示了他异常敏锐的时代触觉,跟得上晚明传媒发展的大潮,能够迅速反应并高效利用,为其文化事业的成功提供事半功倍的助力。

(三)不仅重视作品的刻印,袁宏道也极为注重其传播。刻集之前往往广而告之;每集刻成,立即以之寄赠亲友。伴随推广作品,他往往跟进宣扬自己的文学主张。如在寄给冯琦“小刻七册”

① 序曰:“己酉(万历三十七年)秋,友人曹远生请刻于秦中,而邀余作序。”(复旦大学图书馆藏《袁中郎十集》本《破研斋集》卷首)

② 《遊居柿录》卷十一,《珂雪斋集》第1369页。

③ 《答陶石簪》,《白苏斋类集》卷十六,第234页。

④ 《叙小修诗》,《袁宏道集笺校》卷四,第187页。

⑤ 黄仁生《日本现藏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350页著录。

时,表白“慨摹拟之流毒,悲时论之险狭,思一易其弦辙”的志愿,并自称“倡微和寡”^①,寻求对方的支持。这样,立场鲜明的文学主张与新异生动的作品双管齐下,小集成为强化其主张的最好载体,为他在文坛打开局面发挥了很大作用。钟惺说袁宏道初入文坛“历诋往哲,遍排时流”,曾“四顾无朋,寻伴不得”^②;到万历二十五年刻《解脱集》,袁中道还以“位卑名轻”^③来形容他的处境。但其作品即出即刊,保留了最新鲜活活的趣味;没有经过编选全集时顾虑身后名的小心拣择,泼辣出格的言论随处闪现。^④这种鲜活生动的个性正是时下文坛最缺乏的,因而自有其震撼力。袁宗道说自己“岑寂中读家弟诸刻,如笼鸬鹚,忽闪林间鸣唤之音,恨不即掣绦裂锁,与之偕飞”^⑤,中道则“捧读未竟,大叫欲舞,作而笑曰:高者我不能言,其次我所欲言,格外之论我不敢言。与兄相别未久,胡遽至此!”^⑥相熟如至亲兄弟而如此惊叹,可以想见这些作品动人耳目的效果。汤显祖读了《锦帆集》,赞叹为“明月珠子,的砾江靡”,^⑦甚至说李贽“都将舌上青莲子,摘与公安袁六休”^⑧。梅守箕读了袁宏道诗,大赞其革新之力为“君有昆吾刀,切玉如切泥”,甚至“愧我十年间,冶容效蛾眉”^⑨,翻悔自己过去的模拟之习。可以说,新鲜出炉的袁宏道作品作为其文学主张最有力的支撑,与之相辅相成,迅速在士林搅动了波澜。袁宏道快速走红文坛,书籍出版业的传媒效应功不可没。

(四)以书商经营为主的坊刻虽然只有三次,但都有存世之本。尤其是书种堂本小集及尚白斋本《广庄》常见于各地图书馆,可推知当时印数相当大。商业出版的参与不仅使袁宏道的作品得以

原始形态保存至今,而且大大扩张了其读者群。袁叔度为其出版文集虽然有私人情谊的因素,但两度刻板、规模宏大,表明袁宏道在晚明已经是具有商业价值的文人。绣水沈氏印行的“尚白斋秘笈”(即“宝颜堂秘笈”)的商业意味就更浓厚。这说明晚明文人和商业出版开始建立了一种密切的关联:文人利用商业出版来扩大影响力、参与文坛竞争;书坊也选择一些文人作品来经营牟利。

总的来说,这十余年袁宏道的作品堪称“密集滚动式”出版,其印行和传播路径呈由内及外辐射扩散之势:初次刻印都是自刻或挚友助刻,印数不大,流传方式以寄赠亲友为主。由此形成以袁宏道私交为主的核心读者群,也是后来支持他文学主张的核心人群。这些刻本数量虽然不多,却是袁宏道在文坛形成影响的基础。由于这些读者多属社会影响较大的精英文人,袁宏道的知名度随着他们的认可而逐渐扩散,著作有了更大出版需求;于是书肆介入,大量复刻并通过商业途径发行。袁宏道生前,《锦帆集》《解脱集》《广庄》均刊刻三次,有两次是商业出版;《敝篋集》《瓶花斋集》《潇碧堂集》《瓶史》《觴政》《西方合论》印行过两次,存世本也以商业出版为主;书种堂特别申告“禁翻豫约”,表明袁宏道已经成了一位能给书商带来利润的畅销书作家。其身后不久就有人集结《袁中郎十集》出版,甚至在其中掺入伪书,也说明市场需求的旺盛。由于明代后期中下层文人群体的数量巨大,可以推测他们参与了购买与阅读。时人言诸小集“悬日月而走南北,则人人知当世有中郎矣”^⑩当非虚语,出版业使其作品迅

① 《冯侍郎座主》,《袁宏道集笺校》卷二十二,第769页。

② 钟惺:《与王稚恭兄弟》,《隐秀轩集》卷二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63页。

③ 《解脱集序》,《珂雪斋集》卷九,第451页。

④ 相比之下,公安派其他文人如袁宗道、陶望龄、黄辉等人留下的诗文,则显得中规中矩,难以迅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⑤ 《陶编修石簪》,《白苏斋类集》卷十五,第214页。

⑥ 《解脱集序》,《珂雪斋集》卷九,第451页。

⑦ 《答袁中郎铨部》,汤显祖著,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卷四十五,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9页。

⑧ 《读锦帆集怀卓老》,《汤显祖全集》卷十九,第825页。

⑨ 《读袁中郎诗》,《梅季豹居诸二集》卷三,《四库未收书辑刊》6辑第24册影印崇祯十五年杨昌祚等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434页。

⑩ 毕茂康:《袁中郎先生全集序》,《袁宏道集笺校》附录,第1713页。

速辐射到精英文化圈之外的中下层文人。这样,袁宏道的文化影响就大致呈现出“私刻→精英文化圈→坊刻→中下层文化圈”的走势;但其影响却恐怕不仅是单向的。袁宏道知名度的急速扩大应该会反过来在精英文化圈内引起更多关注;即使仍反对他的文学主张,却不能不重视他掀起的文坛波澜。

袁宏道著作的刊刻、传播对其文坛声势扩张的作用,透露出—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信息:到了晚明,影响文坛格局的因素更趋多元化。出版业反作用于文坛的情况在宋代就已经出现,南宋末江湖诗派的兴起就直接由书商主导,被学者视为文学的“近世化”现象。^①然而这一近世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直至明代中叶,像江湖派这样由出版业介入文坛的成功例子仍然非常罕见。纵观《列朝诗集小传》和《明史·文苑传》,明代前期和中期引导时代主潮的一线作家,大多从京师上层官僚核心文化圈发迹;影响文人文坛地位的,仍以文化家世、政治影响、前辈大佬的鼓吹等权威性因素为主导。嘉靖以后刻书业急速繁荣,给文坛带来冲击,袁宏道的例子生动展现了文人对出版业的一

次高效利用。以往文人主要出于传世的愿望编选刊刻文集,像这样自觉地利用出版来谋求当世文化影响的例子并不多见。而袁宏道著作的密集刊行,反映出晚明文人私刻著作的情况极为普遍。刻书的费用低廉,稍有财力的人都能够负担;即使手头吃紧,找到相应的资助也并不太难。这是今天明清文集大量存世的基本原因;它意味着各阶层文人,不仅是上层官僚,还包括核心文化圈以外的低级官员,甚至没有出仕的平民文人,都不难获得使自己的作品面世并流传的机会。私刻与坊刻相互配合促成袁宏道影响力的加速扩张,体现出民间文化力量的增强,书肆的商业力量介入文坛。书肆的发售对象不必有阶层的限制;也就是说,当“人人知当时有中郎”的时候,他在上层士大夫主流文化圈即使尚未完全获得认可,也已经通过普遍的走红形成了巨大的文化影响;他带动不少文人改变欣赏趣味和写作方式,冲击了当时的文学主潮,成为时代文坛不可忽视的突起异军。袁宏道的成功,切实体现了来自士大夫以外的、更广阔文化圈的非权威性因素,影响晚明文坛格局时力量的上升。

The Printing and Circulation of Yuan Hongdao's Writings and their Influence upon the Literary Circles

Li Xu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Folk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external factors which had an influence upon a writer's position in the literary circles could be divided into authoritative and unauthoritative ones. Yuan Hongdao (袁宏道) tried to draw attention from the literary circles in various ways, among which an important one was making full use of block-printing industry that developed rapidly during the late Ming Dynasty. From 1597 to 1609,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Shenzhong of the Ming Dynasty (明神宗), he had his writings printed at least fifteen times. His readers extended from officials to lower-class literati due to the circulation of his writings. His published writings produced an influence upon a lot of readers and writers and caused them to change their aesthetic taste and writing style, which turned him into an unnegligible figure in the literary circles. Yuan's success showed that the unauthoritative factors from lower-class literati had a growing influence upon the literary circle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Yuan Hongdao (袁宏道), block-printing industry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literary circle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Shuzhong Hall Press (书钟堂)

(责任编辑 郑园)

① 参见内山精也著,朱刚译:《宋代刻书业的发展与宋诗的近代化现象》,花莲:《东华汉学》,2010年6月。